

· 教育学学科建设 ·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身份认同的实践逻辑

闫广芬, 范秋艳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的国家诉求,为研究生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使其学科身份认同问题显得更为紧要。系统认识研究生教育学的合理性是其获得身份认同的逻辑前提,而将合理性转变为合法性是其获得身份认同的关键。研究生教育学学科身份认同的实践逻辑在于深入分析和阐明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进而走出经典学科范式,在现代学科视野下重建其合法性。涵育学术共同体自觉的现代学科意识,守持兼具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学科发展理路,依托“学科智识”推进知识社会中研究生教育的变革,是当下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之路。

关键词: 研究生教育学; 合理性; 合法性; 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4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21)08-0063-08

The Practical Logic of Discipline Identity in Postgraduate Pedagogy

YAN Guang-fen, FAN Qiu-yan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demand of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rovid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erging disciplin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which makes its disciplinary identity more urgent.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ionality of postgraduate pedagogy is the logical premise to obtain identity, and the key to obtain identity is to transform rationality into legitimac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postgraduate pedagogy identity lies in the in-depth analysis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subject nature and research object, and rebuilding the legitimacy in the modern discipline vision without the limit of the classical discipline paradigm. To construct postgraduate pedagogy, it should cultivate the modern discipline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community, maintain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principle with both Chinese standpoint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by relying on “discipline intellectual”.

Key words: postgraduate pedagogy; rationality; legitimacy; identity

收稿日期: 2021-03-26

作者简介: 闫广芬(1964—),女,河北沧州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范秋艳(1994—),女,山东青岛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蓬勃发展,研究生教育学应运而生。发展至当下,研究生教育学已“内外兼修”:从“外”观之,专业学会组织、专门学术期刊以及依托自设二级学科搭建的专门人才培养单位不断涌现,组织建制日臻成熟;向“内”察之,研究生教育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日益多元,理论构建愈加深入。^[1]2020 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确定的“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的重要精神,以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见》描绘的“到 2025 年基本建成高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到 2035 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不仅直接促发了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转向,更引发了深入推进研究生教育学发展的强烈吁求。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研究生教育学“呼之欲出”,它已然具备了学科创设的实践基础。但是,研究生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未获得身份认同,学界对此并未达成一定的共识。只有学科身份明确,学科行动方能开展。因此,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身份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亟须厘清研究生教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而探寻研究生教育学如何获得学科身份认同,最终才能更好地以“学科智识”资源助推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

一、研究生教育学作为学科的合理性审视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始于其以学科形态发展的合理性。合理性问题涉及学科存在的根本价值和意义,而回答该问题的主要依据在于时代大趋势产生的需求和学科独特性的彰显。我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面临的挑战,以及由于研究生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化,即使在其关系最为密切的高等教育学内研究生教育也未能得到深刻、充分关照的现状,这些都为研究生教育学的建立提供了充分的合理性依据。

1. 研究生教育学的价值意蕴

首先,统合研究力量,为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专业支撑。伴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也发展至一个新的“拐点”,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进步的重要主

题。改革总是一个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的过程,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大致存在三类问题。其一是老问题新形态。如扩招使导生矛盾加剧且形态多样化,博士生的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有待调整完善等。其二是研究生教育的基本问题。如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内涵要素及运行基本规律等。其三是新阶段中的新问题。如学科专业发展对紧缺人才和新型人才培养的支撑不够,在线研究生教育模式和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尚待深入探索,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差异化培养等。鉴于现代实践格局的超常型和超经验型发展趋势,解答老问题不能再单纯依靠“散兵游勇式”的零星研究,对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也不能再单纯依赖管理者的实践摸索,对新问题的尝试性探索更不能单纯诉诸经验总结。有学者分析 2013 年以来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后发现,在整体改革框架、改革目标和治理体系方面,存在内涵混乱、目标不明等诸多问题。^[2]实践证明,科学的改革需要规律探索取向的系统深入的研究,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要注重系统设计与科学规划,而唯有以学科为中心,才能更好地聚集研究力量、规范研究行为,真正实现对研究生教育实践的有效指导和智力支撑。

其次,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提升高等教育强国“穹顶”的高度。2015 年以来,以“双一流”建设为牵引的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建设方案的实施,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从框架搭建阶段迈入整体施工的新阶段。所谓“整体施工”,意味着各层次高等教育协同发力以及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整体优化,研究生教育位居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自然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内容。21 世纪初,伯顿·克拉克尚对研究生教育的边缘地位存有忧虑,“在任何国家的高教系统,第一级学位这个层次在历史上都居首位,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紧紧抓住传统的思想和实践。在决定预算、公众的注意以及政府的关切方面,都首先考虑第一级学位这个层次,于是,研究生教育或高级教育易于在边缘发展”^[3],然而在今天,如果说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强国之地基的话,那么研究生教育则是高等教育强国的穹顶,决定了高等教育的高度。相比之下,研究生教育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体系中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不仅在研究生教育经济学、研究生教育社会学等方向存在空白,独立的理论体系更无从谈起。因此,无论是研究方向的拓展,抑或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都必须立足学科来培育专门研究队伍,探寻研究生教育规律,将经验总结升华为理论体系,最终构建起研究生教育

的中国学派和理论体系。

再次,拓展学科服务范围,与高校智库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构建。研究生教育与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动关系,“科学、高等教育和政府之间的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发生在大学教育的最高层次的计划的安排上”^[4]。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推进的形势下,以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社会政策共识,研究生教育必须承担起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始创新、解决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培养国家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使命,研究生教育学的学术格局再不能限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内部,而是要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库,充分发挥高校智库的作用。基于专业人才资源、专门知识基础和国际交流网络,作为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学将拥有更强的政策研究和咨询能力,能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为科技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提供决策咨询,为相关政策实施提供科学准确的评估分析,积极应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基础科研能力。相应的,在服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研究生教育学也得以面向国家发展战略,将理论研究、战略思考、政策设计相结合,进而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拓展学科前沿,建立并完善知识生产协作机制,不断更新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进而形成新的学科增长点。

概言之,当今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方位是,处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整体化推进叠加的一体化进程中。研究生教育学既是支撑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的“科学”,致力于服务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现实主题以及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目标;也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哲学”,需要对我国研究生教育进行系统、本质的反思,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和学派。

2.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学尚未深耕的“领地”

一门学科之所以可称为学科,首先在于它“不是单纯由高层学科或相邻学科推演而来,其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5]华勒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6]。研究生教育学之所以有必要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原因在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将“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本科教育”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而研究生教育因规模小、起步晚,并未

得到高等教育研究更多的关照。伴随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扩张、地位提升以及诸多问题涌现,研究生教育开始进入学者视野,研究生教育的独特性在研究中逐渐呈现并且愈加明朗。从培养对象上看,研究生这一群体具有多重属性,他们既是学生,又是研究者。从层次上看,研究生教育以“专、深、精”为标准,以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纵向知识链条中,研究生教育被定位为一个连接本科学习和知识生产的中间层次。从范域上看,研究生教育既培养人才,归属教育系统,又生产知识,连接科研体系,但是,相对于普通科研体系,研究生教育具有教育性,相对于其他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具有高深知识研究性,从而超越了单纯的教育形态或研究形态,研究生教育实质是一个教育逻辑和科研逻辑并存且互动的特殊场域。从知识特性上看,研究生教育根植于不确定的、专门性的高深知识,由此形塑了它以专业化为取向、以科研—教学—学习统一体为培养模式、以知识贡献度及问题解决能力为评价标准的独特运行方式。

张楚廷在论及“教育是什么”时一语中的——“教育就是教育”^[7],他意在彰显教育本身的特性与自信。同样的,研究生教育就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问题难以用本科教育的理论和逻辑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研究如果不开辟自己的领地,不汇聚形成自己的“部落”,“其发展的独特性与价值则难以得到彰显,在研究对象分析上的明晰度和问题解决中的穿透性都会显得不足”。^[8]诚然,在成长初期,研究生教育研究是在借鉴高等教育学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也可以说是脱胎于高等教育学,但当下研究生教育学更需对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有所突破。

就时代趋势而言,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亟须在新组织建制下开展理论建构、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等工作。就学科独特性而言,研究生教育在诸多方面与高等教育殊异,倘若采取从高等教育学中简单演绎的方式构建研究生教育理论体系,则极易将二者混淆,不仅无法显示研究生教育学自身之为学科的独特性,更无助于研究生教育实践。由是而论,研究生教育学分化为与高等教育学并行的二级学科乃时势所趋。当然,存在价值(合理性)与学科成立(合法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逻辑,前者不是后者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仅仅考虑研究生教育的现实诉求,那么研究生教育学的合法性就将陷入类似高等教育学“让渡的合法性”窘境^[9],即研究生教育学的合法性是通过研究生教育

的合法性让渡而来的。研究生教育学若想成为一门“实质合法”而非“名义合法”的学科,必须将精力置于提升学科自身效能之上,经历一个以“有为”争“有位”的过程。

二、研究生教育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基础

在我国,合法性始终是一门学科能否独立存在所必须面对的最根本也最敏感的问题。一方面,学科合法性的表征是该学科被“学科目录”收录,被学术共同体和社会承认、认可和接纳,意味着由学科体系的边缘向中心转移,获得了国家、学界和社会赋予的身份和意义。另一方面,“合法性的获得并不是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兴趣的爱好者相互协商宣布成立某一学科这么简单,也不是上一级学会的首肯就意味这一学科具备了合法性,甚至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获得了学位授权就天然地意味着这一学科的合法诞生”^[10],而是一个力求“使它合乎学科标准和规范的努力过程、使它得到‘总学术圈’中其他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努力过程、使它为当今的高等教育体制所容纳的努力过程,以及使它得到官方与公众的承认与资助的努力过程”^[11]。本质而言,学科合法性的过程是一门学科构建并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由此,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也就指向了学科身份认同。所谓学科身份认同的逻辑起点,就是自我身份认同。吉登斯曾精辟地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个体通过其自我经历以及反身性方式所理解和认识的自我”^[12],在这种反思性理解中,学科探寻和确认“我是谁”、“我能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等一系列高度自我关涉的重要命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学科的成熟应以‘自我意识’的形成作为标志,学科缺乏自我意识,其发展就不可能从‘自在’走向‘自为’”^[13]。由此观之,研究生教育学要获取学科合法性必须在反求诸己上用力,其基础在于明鉴自身内在本质,构建独立的学科范式。

从发生学角度来说,研究生教育学是在中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孕育而生的新兴学科,蕴含着强烈的实践品格和国家取向。言其实践品格,在于研究生教育学以研究生教育的现实问题为逻辑起点,以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改进为落脚点,因应实践问题的复杂性而进行跨学科研究。言其国家取向,在于研究生教育学立足中国国情、心系中国研究生教育命运,以中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为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科

体系的丰富素材,累积起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知识基础。阿什比指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学科亦然。“遗传”决定了基因,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在我国研究生教育重整旗鼓、稳步前进、迅猛扩张直至内涵发展的进程中,研究生教育学与之同频共振,以回应研究生教育实践需求为主旨,历经了酝酿积累、始获关注、集体研究、扎实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国家的精神、气质与希求融渗在整个学科机体与发展细节之中,并从深层决定着该学科发展的轨迹与命运”^[14],而一旦“国家基因”作为发展要素融入研究生教育学肌体之中,便成就了研究生教育学科的“中国特色”。“环境”昭示着新要求,2015年以来,“双一流”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行动引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双一流”建设的主旨和方向,因而也是研究生教育学的根本目标。由此不难看出,研究生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烙刻了文化印记、秉承着时代精神,这种成长脉络既形塑它的基本样态,也深刻影响它的发展路向。

立足学科本质,研究生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以高深学问的探究与求索为逻辑起点,以科研为本质,这是研究生教育学的独特性存在之基础,也蕴含着学科范式创新的可能性空间。历史上被视为研究生教育起源地的德国柏林大学,其创建之初就把科研、教学和学习统一的思想确立为永久原则。“科研把教学和学习合拢来成为促进知识的一个无缝的承诺之网,铸成了一个紧密的科研—教学—学习联结体”^[15],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就是科研训练,“一个研究生教育的场所最重要的将是一个科研的场所”^[16]。因此,研究性成为研究生教育区别于本、专科教育的最重要的特质,洪堡在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时就已明确阐释:科学是某种还没有得出完全结论的东西,还没有被完全发现、完全找到的东西,完全性的结论取决于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上的不断反思。可以说,研究性决定了研究生教育对创新的追求,研究生教育与基础教育和本科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内在的强烈创新性及知识贡献力。步入知识社会以来,知识生产的转型改变了科研的模式,基于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或跨学科、跨领域集成性创新研究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颠覆性创新(从0到1的创新)逐渐超越持续性创新(从1到N的创新),这些新的变量催生出对知识创新的新需求,赋予“研究性”全新的内涵,从而也孵化了一种具有新品质的研究生教育。

三、研究生教育学学科身份认同的构建路径

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包蕴于其学科内在本质之中。进言之,研究生教育学若要明晰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实现合理性到合法性的“华丽转身”,则必须对学科的实践性、国家性意涵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性、创新性特质等问题作出系统的、深层次的思考。

1. 涵育学术共同体自觉的现代学科意识

学术共同体是学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学者的担当意识、学术责任、政治勇气、研究素养和理性精神会极大推动学科发展”^[17]。事实上,研究生教育学组织建制的不断成熟——国家、省市两级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和第三方组织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业已形成;自2015年以来,天津大学、南昌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分设“研究生教育学”硕士点、博士点,在学科框架下培养研究生教育的新生代专业研究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都已成为发表和宣传研究生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正是得益于研究生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日益增强的学科意识。

但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对于研究生教育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界仍存在质疑之声。深究下去,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学科发展成熟需较长周期的普遍规律与研究生教育学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依照学科成长的基本规律,学科的发展是累积和渐进的,学科成熟必然要经历时间锤炼。反观研究生教育学,1994年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辞典》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列为一个辞目,“研究生教育学”这一概念自此才得以正式确立;直到2015年,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相继于“学科目录”外设置研究生教育学二级学科,其学科制度化进程才正式开启。学科发展状态受其发展阶段限制,必须承认的是,研究生教育学目前尚在初创阶段,其学科体系还没有达到成熟学科应有的状态。其二是经典学科的学科范式、标准与研究生教育学的现代学科性质之间的矛盾。传统学科发展以知识的自然演化逻辑为主导,从而形成了经典的“三独立”学科标准——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立的研究方法,现代学科的发展则由社会需要逻辑主导,倡导开展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研究生教育学显然属于后者。

若以经典学科标准衡量研究生教育学,它的边缘化状态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获得学科合法性更是意料之中。

对于学科发展规律与发展阶段之间的矛盾,我们理当辩证对待,由于学科尚未成熟而质疑其存在价值未免有失公允。有学者指出,学科角色意识是学科得以生成与演进的动力,它加速理论体系的创生、内部知识的集约以及学理系统的延伸。^[18]这正是默顿意义上的“社会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即“某种期望、信念或预测会使人们按所想象的情境去行动,结果最初并不真实的语言会应验,变成现实”。^[19]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前景必须以坚定的学科自觉意识和根植于理性的学科信念为前提,具体而言,要坚持对研究生教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追求,基于对研究生教育的深刻理解,将学科的独特性内化到研究中,将思考和话语逐渐提升到学科意义上自觉和自为的水平,并进一步探索研究生教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从而构建具有研究生教育学风格的独立学科体系。

至于依据经典学科标准的诘问,固然是以研究生教育学与经典学科标准之间的不匹配为表征的,但其根源在于对研究生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误解,至少也是认识较为模糊。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乃是重返研究生教育学的实践品格,实现从经典学科思维向现代学科思维的转变。换言之,研究生教育学回应经典学科标准诘问的办法是建立现代学科范式。2020年,出于破解重大现实难题和复杂非线性科学问题的考量,国家将“交叉学科”设置为第14个学科门类,这反映了一种社会需求与知识发展并重的新学科思想。学科制度改革所释放的信号是,对于现代学科而言,“三独立”标准要求并不在实际社会贡献要求之上。研究生教育学科应当从经典学科叙事中走出来,立足于提升研究生教育理论的社会贡献度,尤其是有效指导研究生教育实践,进而发掘研究生教育的基本规律,提炼出相应的理论,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简言之,问题研究与理论构建比翼齐飞,这是研究生教育研究的基本向度,也是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化发展的应有逻辑。

现代学科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高度开放性,因此,研究生教育学必须以广阔的胸怀和开放的视野积极推进学术研究。其一,对研究背景复杂性的包容。当代研究生教育变革处于后工业化社会图景中,面临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知识加速迭代、多学科交叉渗透等交织的复杂格局,研究生教育学必须从这些新生因素出发,思考如何在社会运行复杂化、不确定

性普遍存在的环境中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而适应并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其二,要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生教育学面对的是综合的、复杂的现实问题,而“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20]。研究生教育研究必须突破不同知识领域间的区隔,接纳并倚重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范式,将不同学科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成果以有效的方式纳入学科体系。其三,要深入挖掘并不断丰富研究内容。鉴于研究生教育学正处在成长阶段的客观事实,既有很多经典主题尚待进一步发掘,也有诸多时代议题不断涌现,如交叉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建立大数据驱动下的研究范式等,研究者因而要保有对丰富学术价值问题的敏锐觉察力,既要有自己独特的关怀,也要充分考量时代、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2. 守持兼具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学科发展理路

研究生教育学的价值向度究竟是中国特色还是世界一流?这是涉及研究生教育学学科性质的重要问题,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生教育学的发展进路。从逻辑来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体系是开放共通的,离开了世界参照就不能成其“一流”,而失去了立足中国国情,不能服务中华复兴并体现中国创造,学科建设的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更遑论“世界一流”。^[21]循此逻辑,研究生教育学的建设路径当是以中国为立场,探索适应本土的学科道路,以世界为范域,铸就誉满全球的学科品质。在实践中,如何内塑中国立场、外拓世界视野就成为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所谓“中国立场”,是指确立中国研究生教育在研究生教育学中的主体地位,以中国为立场的研究生教育学,其生命力源于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当代境遇和现实教育诉求的积极回应。其一是重返历史。中国传统教育实践包含了丰厚的研究生教育思想资源,蕴藏着推动研究生教育学发展的巨大基础能量。从“有其其实而无其名”这一角度来看,研究生教育在我国历史上可谓古已有之。譬如,作为翻译语汇的博士与古代汉语的博士,均指学养高深者,博士学位与博士学官似有内在关联;作为侧重学术研究的教育建制,中国古代书院已具备研究院的性质,研修学问的方式与研究生培养多有类似之处。^[22]因此,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思考,首先要在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找寻古今思想的接榫,并基于此来理解和阐发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路向。其二是立足国情。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所建基的最大、最根本的实际是,中国研究生教育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迫切需要用新理论新方法反映和分析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遇到的矛盾和挑战,迫切需要把研究生教育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到基本规律,进而转化成系统的科学理论。其三是引领未来。研究生教育学必须努力寻求中国研究生教育未来的理想图景,使学科研究真正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制度和实践的改进。

研究生教育学的“中国立场”,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研究生教育、用西方的理论话语和价值标准来裁剪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对源于西方的一些理论,要根据中国语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有效修正,使其能切合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然后再运用修正过的理论为中国研究生教育服务。另一方面,要使中国成为研究生教育学摄取新知的富饶土壤,总结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经验,提炼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研究生教育学必须站在中国时空维度来审视研究生教育,但若一直不走出“洞穴”这个可见世界,就无法看到洞外可知世界的真实样子,更无法确认自身的位置。

“世界视野”要求将中国研究生教育融入世界研究生教育体系之中,在国际坐标中秉持全球格局来谋划发展与改革。其一,要秉持开放思维。坦率地说,就学术积累而言,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仍比较明显。西方研究生教育发端于19世纪初的德国柏林大学,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则是在1917年国立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建立后才正式开启了实践进程,西方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较我国更为悠久,研究生教育发展也更为成熟,理论积累更为丰厚,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西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绝非静态的、线性的,而是在时代演变中不断思考未来走向,这些都可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践和研究有价值的参照和借鉴。因此,研究生教育学要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在与世界研究生教育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借鉴和吸收世界研究生教育的有益知识成果和实践经验,从而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创新能力。其二,要树立“以世界为目的”的意识。中国研究生教育和西方研究生教育同为世界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构成主体,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正经历巨大变化,世界研究生教育也面临着变革与挑战,在此背景之下,世界研

究生教育研究要实现范式变革和理论创新,也离不开中国研究生教育研究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解释和知识创新。因此,研究生教育学要建设既能涵盖中国特质又能为世界接受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在世界舞台上加以阐释和论证,增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3. 以反思、变革研究生教育为方法赢得学科合法性基础

既有的研究生教育是伴随着知识生产模式 1 的形成而确立起来的,其科研活动追求的是“学科知识”生产以及“为科学而科学”的象牙塔理念,至于学术成果如何应用于社会则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或至少不受重点关注。由此衍生的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基本制度在本质上都遵循学科知识结构、学术共同体组织文化和同行评价原则。在以知识民主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场所从大学拓展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此时,“可靠知识”(在学科情境下生产并对其有效的知识)的边界极大延伸,甚至被一种更加丰富和更具活力的知识形式——“社会稳健性知识”(在社会开放情境下生产并对其有效的知识)所替代。这场知识价值革命正在颠覆“学院派知识生产模式”,科研成为企业、政府机构和非营利部门的共同活动,由于边界的不断扩展,科研正经历着一种“大众化”,它鼓励研究者走出旧的居留地,朝着更多方向寻找新的边界。基础科学日益被视为一种必须作出“社会—经济贡献”的公共资源,“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衡量大学学术知识的重要程度的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市场上应用的程度,进而演变成为制约大学科学研究方向的生存法则”^[23]。“模式 2”、“模式 3”、“大科学”、“后学院科学”等概念代表了科研发展的逻辑转换。最终,由大学、产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多元主体以非线性方式进行协同创新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的诞生宣告了一个新科研模式的出现。

与被时代裹挟前进的知识生产活动相比,研究生教育的科研模式仍然被象牙塔时代的学术范式所支配。“目前,思维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当对象、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为思想的扩展创造或确定了前提的情况下,仍旧以不变的形式、范畴、概念等来思考。”^[24]学科模式的研究生教育的确限制了它面向未来的潜力和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可被视为诸多研究生培养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知识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挑战,既给了研究生教育系统重新检视自身问题的机会,也成为构建研究生教育学的元动力,为其谋求合法性提供了契机,

而这一契机跃变为现实的第一推动力是“学科智识”。弗莱克斯纳将智识视为专业实践的核心,是“自由、机敏、无障碍的智力应用于问题理解和把握”。^[25]沿着弗莱克斯纳的理路,我们将“学科智识”定义为运用高深、系统、前沿的专业知识与智慧来反思、理解并指引研究生教育实践的活动,其中隐含着“自由”和“责任”两个特征——研究生教育学既拥有对研究生教育的想象空间,也必须承担起推动研究生教育卓越发展的责任。从而,研究生教育学智识力的无限潜能成为研究生教育前行中最强有力的动力系统。

依托“学科智识”,研究生教育学首先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研究生教育,并从学理层面澄清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本体价值,对知识社会中研究生教育的存在形态及运作方式作出创造性的阐释。研究生教育理念是研究生教育运行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基础,是引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形塑研究生教育运行机制的内在逻辑。研究生教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从学理、学说、学科上对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深层反思和剖析,探索并提炼具有时代特色的研究生教育理念,将社会和国家提出的研究生发展最新诉求、愿景以及时代对研究生教育的迫切需求融入研究生教育理念系统,创新理念内涵,以此推动研究生教育运行机制的优化,促进研究生教育实践的发展。

由于知识社会的强大冲击力,研究生教育已经不能再“作为紧急科研任务的侍女慢吞吞地跟在后头走”,研究生教育的当代逻辑必定包含“知识民主化”的鲜明特征,应以知识情境化、社会化、市场化等方式重塑研究生教育。与之相呼应,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使命也应转向创新科研模式,变革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系统的整体形态,激发研究生教育在“打破界限、重新连接、支持不同团体的互动、科学—文化复魅”中的创造性潜能,为保障研究生教育能够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机构和多元话语相互交流的场域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现代学科的精神不仅来源于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更来源于实践的不断变革、突破和创新。在知识社会中,经济全球化趋势、社会文化演变等裹挟着知识生产迅速跃入模式 3,信息技术革命甚至有可能将知识生产带入模式 4。由此,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不再是简单线性的,而是充满无限可能性,研究生教育需要适应这种持续不断的演进并实现自我革新。研究生教育学只有在批判和反思中重新理解研究生教育,才能在变革中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换言之,研究生教育学要用变革的气质不断为研究生教育注入活力。在加速化、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成为社会的新常态时,“很难画出一份准确而具有时效性的地图,因此使用指南针找准方向,要比按图索骥有意义得多”^[26],在创新的过程中为创新者指明方向,指南针可以帮助其在探索中不偏离目标,并且从全局角度出发理解遇到的难题。同样的,明晰未来研究生教育变革的性质和方向能够让研究生教育正确且快速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知识生产环境,这是研究生教育学必须要重视的盲点——目前来看研究生教育的方向仍不明晰。

对研究生教育学而言,拥有对研究生教育现实进行反思和变革的信念,依托“学科智识”,为研究生教育的变革提供指向,在不断重构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使它获得新质,唯此才能提升学科影响力,而研究生教育的探索精神和科研气质也同时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在这种互动中,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学都将不断实现质态飞跃,研究生教育学以“有为”争“有位”的过程最终体现为一个在学科价值挖掘和能力提升中追求学科身份认同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王传毅,杨佳乐,刘惠琴. 研究生教育学之学科建设:路径、进展与方向[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3):53-59.
- [2] 梁传杰. 高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模式:审视与重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11):1-7.
- [3][4] 伯顿·克拉克. 研究生教育的科学研究基础[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06,405.
- [5] 刘仲林. 现代交叉科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0-31.
- [6]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
- [7] 张楚廷. 教育就是教育[J]. 高等教育研究,2009,(11):1-7.
- [8] 闫广芬,王红雨. 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背景、意义与行动[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5):7-12.
- [9] 王建华. 高等教育学的建构[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0.
- [10] 袁本涛. 研究生教育学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其挑战[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7):43-49.
- [11]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13.
- [1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18.
- [13] 夏正江. 教育理论哲学基础的反思——关于“人”的问题[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
- [14] 龙宝新. 论中国特色一流学科建设[J]. 高校教育管理,2020,(3):1-8,29.
- [15][16] 伯顿·克拉克. 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 王承绪,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
- [17] 任剑涛. 与国家命运共振:70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J]. 广州大学学报,2019,(5):7-19.
- [18] 陈曼军. 学科学导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308-310.
- [19]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 林聚任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86.
- [20]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陈强,张永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53.
- [21] 周杨. 在科学和法治的轨道上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学学科建设——张文显教授访谈录[J]. 中国大学教学,2017,(8):4-13.
- [22] 周洪宇.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59-262.
- [23] 张学文. 大学理性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4.
- [24] 朱丽·汤普森·克莱恩. 跨越边界——知识 学科 学科互涉[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 [25] FLEXNER A. Is Social Work a Profession? [J].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01,(2):152-165.
- [26] 伊藤穰一,杰夫·豪. 爆裂: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M]. 张培,吴建英,周卓斌,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5.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